

## 香港脈搏

## 應加強支援婦女職業發展

參考政府的人口數據，香港不但是個女多男少的社會，女性的教育水平更相當高，以2013/14年度為例，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中，女生的百分比達53.7%，而修讀研究院課程的女生比例更達60.8%。誠然，本港女性已在教育機會上獲得平等的權利，整體教育程度甚至可能較男性為高，可是在經濟事業發展方面，女性卻依然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。

## 港女性事業發展不如男性

統計處近月公布了最新的薪酬數據，筆者留意到女性的時薪中位數竟遠低於全港整體的時薪中位數，男僱員的月薪中位數較女僱員高逾兩成，男女之間的時薪中位數亦相差12元，而無論是技術工作還是非技術工作，或經理、行政及專業人員級別，女性的時薪中位數均較低，反映女性的收入整體上低於男性。再參考一下其他資料，例如1299名首長級公務員中，只有445位女士，僅佔34%；在全體司局長中，更只有一位女性；在特區政府的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委任非官方成員中，女性委員比例只有32%；本港的上市公司中，只有11.3%的董事會成員為女性，更有38%上市公司完全沒有女董事。上述數據充分反映了本港女性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遠較男性低！

當然，導致女性事業發展不如男性的原因很多，難以簡單地歸咎於性別因素。不過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，港人的中國傳統思想根深柢固，普遍認同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和「女性應專注於家務」，尤其是女性須肩負生育的責任，亦難免妨礙了女性的職場發展。

## 政府應提供政策支援

筆者以為，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是本港重要的勞動力，與維持本港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；同時，我們亦應明白到婦女在中國傳統家庭觀下，確實須承擔更多家務。故此，考慮到婦女在社會角色的雙重性，在推動更多婦女發展個人事業方面，政府應提供更多政策支援，協助婦女兼顧事業與家庭，進而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。例如政府可大力鼓勵僱主提供彈性上班時間予女性員工，讓她們能夠早一點下班處理家務，或延後上班時間以陪同子女上學。甚至乎，在互聯網時代，企業可思考一下婦女是否必須每天回公司工作？還是可讓她們留在家中處理部分工作？衆所周知，本港失業率長期處於百分之三左右的低水平，幾近全民就業，不少企業近年一直受到「僱員不足」的困擾。筆者相信，採取彈性上班時間的公司對婦女必然有更大競爭力。在去年，國際辦公室空間供應商雷格斯(Regus)的調查亦發現，有90%受訪者認為，最有效激勵母親重返工作的措施是採取彈性上班時間，很值得大家注意。

政府亦應進一步完善社區託兒服務，增設更多託兒所及延長服務時間，分擔婦女照顧和接送孩子上下課的壓力，讓婦女能夠安心工作。此外，政府亦可在婦女的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提供更多資助，增加基層婦女向上流動的能力，也有助一些專注照顧家庭多年的婦女重新投入職場。政府還應加強保障懷孕婦女，避免受到僱主的不公對待，以及關注男女員工之間「同工不同酬」的情況。最後，在歐洲一些國家，如德國、西班牙、挪威等，均已立法規定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比例，港府可研究一下其可行性。

## 局長隨筆

美國對古巴實行封鎖、禁運半個世紀後，終於調整政策，最近兩國首腦在美洲峰會上會晤，兩人的握手照片成為國際傳媒報道的熱點。其實，兩人第一次握手是在2013年12月，地點在約翰內斯堡，當時他們是一同出席南非已故領袖曼德拉的喪禮。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的唁電中，讚揚曼德拉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，中國人民永遠銘記。

## 曼德拉令人銘記

曼德拉以廣闊胸襟和深邃的政治智慧，推翻了長期以來纏繞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，贏得全世界推崇，所以多國領導人都參加了曼德拉的喪禮。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的唁電中，讚揚曼德拉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，中國人民永遠銘記。

近日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從歐洲遠道來訪的愛爾蘭官員，想不到，又談到曼德拉。訪客從本國經驗，介紹如何由對立走向和解，當中就有南非曼德拉的角色，而且把他視為對愛爾蘭今天和平日子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偉大人物。

若把時光倒流到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，哪怕是九十年代去，北愛仍是個可怕的地方，不知道街頭什麼時候會響起槍聲、爆炸聲。人們聞IRA（北愛共和軍）而色變。愛爾蘭無可避免地受到北愛的影響。

1990年，自1964年被判終身監禁而投獄的曼德拉重獲自由，他重新投入到消除種族隔離主義的運動，推動和解協商，在極右白人與激進黑人的雙重壓力下，最終贏得理解，解決了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齷齪難題，南非自此進入多種族共融、和平建設的新時期，曼德拉並在1994年當選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。

這時候，北愛仍然硝煙四起，武裝鬥爭造成許多傷亡，包括不少無辜平民。

## 推動進步人民銘記

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

南非達成種族和解的典範，對北愛互不退讓的兩派都有所觸動，但各方持續進行了多年的談判一直膠着，在社會的嚴重對立下，彼此都找不到退讓的空間。兩派背後的英國和愛爾蘭，也勢成水火。

## 促成北愛和解

曼德拉當選總統後不久，公開擺出「全力支持北愛和平進程」的姿態，邀請被很多人視為「政治賤民」、主張北愛脫離英國的新芬黨領袖阿當斯到南非法訪問。這成為對北愛和平進程非常有力的推動。

1997年，當我們忙於香港回歸的時候，曼德拉邀請繼續陷於僵局的北愛談判各方，避開貝爾法斯特緊張的政治氣氛，到南非開普敦喘一口氣，安靜談判。可是這一點都不容易，統一派（主張北愛繼續留在聯合王國）開始時連與對手坐在同一個房間聽曼德拉說話都不願意。

這一派當時有份參與談判的一位代表多年後回憶說：「他（曼德拉）說了一些我覺得意義非常深刻的話，就是：對朋友是不必和解的，正是對敵人才需要和解。」

曼德拉很重視妥協，認為「你若不準備妥協，就不要去談判，想也不要想」。

在拉攏雙方談判之初，曼德拉提出，愛爾蘭共和軍要先宣布停火，否則它的政治代表新芬黨無法在談判桌旁找到座位；對於統一派要求對方宣布停火並銷毀武器，他認為宣布停火就夠了，銷毀武器是下一步的事。

這樣的談判在他的促成下艱難地展開了。一年後，就在復活節前，有關各方達成了歷史性的「耶穌受難日協議」，北愛實現了和解。

曼德拉沒有到過北愛爾蘭，但愛爾蘭人沒有忘記他。

## 名家指點



李克強總理

在接受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專訪時指出，目前人民幣總體上處於基本穩定的水平，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，因為中國不能靠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，不注重擴大內需的話，中國的經濟結構很難得到調整。

## 匯率貶值不利結構調整

中國總理用如此直白的方式表明不希望人民幣貶值應該是第一次。所以，就如我在年初時所指出的那樣，儘管美元的強勢在2015年不會改變，但是相對於美元來說，人民幣匯率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小幅波動，大幅貶值概率不高，而相對於非美元貨幣來說，人民幣為強勢貨幣的格局也不會改變。因為，中國政府不希望人民幣貶值。

至於李克強總理希望人民幣不貶值的理由有三，一是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基本上處於穩定水平或均衡水平，因此，人民幣的貶值就會打破這種均衡水平，對哪一方來說都是不合適的；二是在許多國家來看，貨幣的競爭性貶值，其目的就在於通過貨幣的貶值來刺激本國出口，否則過於強勢的貨幣會影響一個國家商品出口的。但是對於中國來說，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，不需要靠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，而是要靠增加內需來保證穩增長；三是人民幣貶值不利於中國經濟

增長方式的轉變，不利於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，所以政府也不希望人民幣貶值。

但是，這些只是政府不希望人民幣貶值的一般性原因。在當前，以信用貨幣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，要想找到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均衡價格是相當困難的，更何況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的貨幣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## 維持小幅上下波動最好

其實，中國政府不希望人民幣貶值最為重要的理由應該是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就得靠強勢的人民幣來支撐。如果人民幣快速貶值，即使對非美元貨幣貶值，也會嚴重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，甚至可能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化突然終止。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或企業接受將貶值的貨幣。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進展小，這是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的。特別是當前中國政府要實現宏大的「一帶一路」振興中華的夢想，更是需要強勢的人民幣來支撐。

二是人民幣貶值會嚴重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。我們應該可以看到，中國之所以能夠短時間內成為經濟強國，既與國內經濟快速增長、出口旺盛、總體實力經濟提升等方面的因素有關，更與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的快速升值有關。2005年以來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或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升值

## 易憲容

達到40%以上，而實際有效匯率則升值50%以上。試想想，人民幣如此快速升值，以貨幣來計算GDP，相對其他國家來說，中國的經濟實力豈能不快速上升？因此，為了保持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，政府是不希望人民幣貶值的。

三是人民幣的貶值特別是人民幣大幅度貶值，就可能造成國內資金大量地流出中國。

從最近的情況來看，今年以來不僅中國外匯儲備減少1000多億（這可能是持有的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化貶值，也可能是內地居民增加持有美元資產並用於海外投資），而且一季度的外匯佔款同比少增1.04萬億元，這可能是內地資金流出中國或企業持有外幣不結售等結果。

如果大量的資金流出中國，不僅會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，也會影響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國政府肯定不希望人民幣貶值。

總之，在當前的情況下，以利益來權衡，中國政府是不希望人民幣貶值的。但是，人民幣也不能夠大幅升值，人民幣的升值不僅會使國際上的熱錢流入炒作中國資產，導致匯率套利交易盛行，而且也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另外一種程度的傷害。比如嚴重影響出口，國內資產價格泡沫進一步上升等。

最好的方式還是維持人民幣匯率小幅上下波動最好。因為，就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來說，人民幣沒有再大幅升值的實力。



李克強總理表示不希望人民幣繼續貶值。

## 來自港府

## 投資基金扶助科創企業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

有不少人很欣賞馬雲先生，對阿里巴巴如何由籍籍無名的小公司發展成資訊科技巨企很感興趣，也有不少業界人士討論香港何時才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科創企業。

## 科創企業資本缺乏

事實上，政府一直推動各行各業善用科技，務求提升香港的創造力，加強業界競爭力，拓展知識為本的高增值行業。過去十多年，我們做了大量工作，例如設立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；推出投資研發金回贈計劃；興建科學園及數碼港等科技基建；成立五所研發中心；加強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系在科技方面的合作；以及透過各式各樣的宣傳及教育工作，培養創新及科技風氣。這些工作都為香港發展成具規

模的科研基地奠定了基礎。

要使本港的創新及科技業壯大，鼓勵創業和增加私人投資是十分重要的一環。在這方面，香港科技園公司（科技園公司）一直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夥伴。自1992年起，科技園公司已透過其「科技創業培育計劃」，培育超過500間初創企業。科技園公司更於去年設立「飛躍企業促進計劃」，向具潛力的初創企業提供更深入的支援服務。另外，科技園公司又通過成立「香港天使投資網絡」及「香港科學園創業投資夥伴計劃」等平台為科技企業提供接觸天使投資者、創業基金或企業投資者的機會。

香港的科研人才不乏創新意念。例如，一間完成「科技創業培育計劃」的公司，最近便憑着其研發的

「森林火險監控系統」，在「IBM SmartCamp 全球總決賽」中獲選為「全球年度創業家」。這只是眾多本地科研成果獲得國際認可的其中一個例子。然而，在科研成果商品化的過程中，初創企業的發展速度及規模往往因資金短缺而受制約。在美國硅谷、以色列等科研發展蓬勃的地區，投資科技初創企業的風氣盛行。Facebook、阿里巴巴等資訊科技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擴展到今日的規模，也是靠創投基金支持。香港雖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吸引大量資金到來，惟創新科技投資風險高，回報期長，所以願意投資本地科創企業的創業資本相對缺乏。要改變這個現況，我們需要提供更大誘因，加速為社會注入新的文化。

## 設立科技企業投資基金

就此，科技園公司已預留5000萬元，設立「科技企業投資基金」，目標是以一對一的比例，與私人資本配對，共同投資科學園內或曾參與其培育計劃的初創企業。此舉既可為投資者尋找具潛力的投資機會，亦可協助園內科技初創企業的業務發展，創造雙贏局面。根據目前的計劃，科技園公司每項投資的上限為港幣800萬元，連同私人投資者的配對資金，每間初創企業最多可獲港幣1600萬元，一般足以應付在種子至A輪投資期的資金需要。我們會在4月21日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匯報基金的實施框架及最新的籌備進展，期望該基金能夠盡快推出。我相信在政府及科技園公司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們可以營造更為完善的創業環境，牽頭帶動更多對本地創新及科技業的投資，吸引世界各地的科研人才來港發展，為香港的創新科技行業作出貢獻。

## 智庫爭鳴

## 智庫文化待植根

觀塘區議員、城市智庫召集人 洪錦鉉

較早前「團結香港基金」成立，近來湯家驥等人又組成「中間民主派」智庫，筆者期望這能促進香港智庫成員發展，為香港政壇帶來活力。

## 美國智庫貢獻良多

有統計指，全球智庫共有接近7000

個，其中美國最多，計有1800多個。智庫對美國政治、外交和戰爭產生巨大影響，從國內政策、對外談判，到戰爭參不參與，美國政府都充分聽取智庫的意見。而美國確是全球精英雲集之地，智庫除了有些「大美國主義」之外，總能提出相當完善的分析

和建議，讓美國一直領跑世界。二戰後70多年的歷史，是人類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，科技突飛猛進，核戰陰影籠罩，環境問題惡化，第三世界民族自決，亞洲興起，蘇聯自1970年代開始喪失優勢直到崩潰。一個大國面對這些歷史巨變，自然需要調整自己，適應時代，甚至創造歷史，比如美國發展反導系統，打破冷戰均衡，比如「文明的衝突」理論窺見今日世界格局，都是智庫學者提出的。

美國智庫和政府本身緊密結合，很多智庫成員進入政府擔當重任，之後回到智庫，令研究和建議更加縝密和可行。走過這幾十年的「旋轉門」的，包括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好像基辛格、奧爾布賴特、布熱津斯基、賴斯等等，可謂出將入相。

中國也在急起直追。習近平主席多次說，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。現在中國智庫數量全球第二，有400多個，積極就國家政策進行分析和反饋。

## 香港智庫亟待發展

香港智庫本來不少，粗略算來約有20多個，按照人口比例，比內地多數倍。香港的教育水平良好，言論、學術自由也有充分的空間。不過筆者發現，香港的智庫大多集中於民意調查，統計和歸納個別政策的民意，提出反饋，至於前瞻性的長遠政策建議，則比較少見。某種程度上，香港的智庫是比較被動的。

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一個是香港政府一直不重視推動智庫的發展，政府的政策都只是回應性的，缺乏前瞻性的研究。香港的政黨並不成熟，反對派政黨圍繞反對和製造問題，常言道「解決問題是政府的事」。即使是建制派，也沒有完整的政策建議。香港缺乏成熟的智庫，每每新政府上任，還須好像「執藥」一般四處物色人才。由於政黨只能止步立法會，不能直接參與行政，它們的角色和自我定位，很可能因此趨向駁議而非倡議，流於瑣碎。這樣，政黨就會傾向主要由地區、業界利益代表組成，而非獨立的、思想性的政治家。

不過環境也在改造我們。過去香港順風順水，憑「積極不干預」的小政府思路，仍可保持繁榮，但現在已經不可這樣，我們亟須改變。香港的政黨需要與智庫合作，並吸納人才，使政治走上新的道路。

攜手做好香港  
WE ARE ONE

10.11.2011

團結香港基金  
Our Hong Kong Foundation

董建華發起的團結香港基金會於去年底成立。